

欧洲体育教育评论

<http://epe.sagepub.com/>

澳大利亚课程改革二:健康与体育教育蒂莫西·林奇 欧洲体育教育评论 2014年5月29日在线发表 DOI:

10.1177/1356336X14535166

本文的在线版本可在以下网址找到: <http://epe.sagepub.com/content/early/2014/05/22/1356336X14535166>

出版方:



<http://www.sagepublications.com>

代表:

西北郡体育教育协会

有关《欧洲体育教育评论》的更多服务和信息,请访问:

邮件提醒: <http://epe.sagepub.com/cgi/alerts>

订阅链接: <http://epe.sagepub.com/subscriptions>

重印本: <http://www.sagepub.com/journalsReprints.nav>

权限: <http://www.sagepub.com/journalsPermissions.nav>

引用: <http://epe.sagepub.com/content/early/2014/05/22/1356336X14535166.refs.html>

>> [在线优先版本记录](#)- 2014年5月29日

这是什么?

澳大利亚课程改革二:健康与体育教育

©作者 2014 转载及许可:
sagepub.co.uk/
journalsPermissions.nav DOI:
10.1177/1356336X14535166 epe.sagepub.com



蒂莫西·林奇

澳大利亚联邦大学

摘要:尽管澳

大利亚的管理机构暗示其目前正在经历首次全国课程改革,但正如标题所示,这实际上是第二次。然而,迄今为止,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一直负责学校的教育课程。当前的全国课程改革承诺建立一个涵盖健康与体育 (HPE)的统一课程框架,目前正在进行审查。本文探讨了澳大利亚在健康与体育这一关键学习领域的课程改革历史,并指出,当前的审查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能够关注至关重要的“实施”阶段,而这一阶段似乎一直被忽视。

关键词

课程改革、课程变更、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实施

介绍

本文探讨的问题是“从以往的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改革中可以汲取哪些经验教训”。这对于课程改革的成功以及课程的深刻变革至关重要。事实上,尽管澳大利亚课程评估与报告局 (ACARA)和联邦政府明确阐述了以教学法为基础的新课程改革的优势和必要性,但对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学习领域课程的历史构建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和反思,会发现建议的改革与一些现有的、本地化的框架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这一结论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不是出于对课程的整体政治控制以及政治上需要展现改革姿态,那么健康、体育和经济学 (HPE)为何要进行任何改革?政治改革因素强化了这种观点,这可以被视为一种试图控制各州的尝试。

通讯作者:Timothy Lynch,联邦大

学吉普斯兰校区教育与艺术学院, Northways Road, Churchill, 维多利亚州 3842, 澳大利亚。

电子邮件:timothy.lynch@federation.edu.au

各地区教育系统采用问责制议程,而不是强调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与上次国家层面的课程改革相比,课程管理将有何不同?自1901年以来一直承担责任的八个州和地区,其政策的实施和监督将深入到何种程度?(Braithwaite, 1994)

澳大利亚新版健康、体育和体育(HPE)课程的主要编写者杜恩·麦克唐纳教授(2012)将全国范围内HPE课程改革的缓慢进展称为课程改革的“渐进主义”。这一术语指的是“政策的渐进式而非即时性变革”(麦克唐纳, 2012)。政策变革的有限或缺乏变革是少数几项(如果不是唯一一项)评估澳大利亚学校对先前HPE课程改革反应的研究中的一个关键发现。“三个案例研究学校的数据表明,在研究进行时,部分学校的教师并没有按照基于HPE教学大纲的全校课程计划(WSCP)进行教学”(林奇, 2005:224)。尽管这项研究的范围有限,但它确实引发了人们对决定学校HPE教学实施的政策文件的兴趣。

“渐进主义”一词特意选用,旨在代表麦克唐纳(2013:97)所描述的课程的缓慢变化:

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复杂性,渐进式改革或许是课程改革的明智之举?

那么,HPE及其衍生课程在全国各地的不同版本又如何呢?澳大利亚课程学习领域在编写和实施的早期阶段,又经历了哪些有时充满波折的历程呢?

这一论断表明,澳大利亚以往的国家课程改革并未得到持续有效的实施,并引出了一系列可能阻碍改革实施的相关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利益相关者及其利益诉求、不同版本的教学方案,以及试图用一份文件代表所有成员群体所引发的争议。彭尼和哈里斯(1998)的研究指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国家体育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群体是他们研究数据中的一个缺陷。教师们对于改革的必要性意见不一,并质疑改革的必要性。这不仅导致了改革的“拖延”,也导致了教师们对他们不认同的改革的抵制(Jewett et al., 1995)。

教师和非教师利益相关者倡导许多属于HPE范畴的重点领域。这些领域包括心理健康促进、性与生殖健康、食品与营养、安全、药物使用、尊重的人际关系、个人身份和自我意识、体育活动与健身、游戏与运动以及水上运动和水上活动(ACARA, 2012:22)。

因此,在这个可以称之为复杂而丰富的领域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而这个领域代表着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

有人认为,“渐进主义”一词被巧妙而委婉地使用,旨在维护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开放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协同效应,从而优化变革。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将新的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HPE)课程改革贴上“渐进二元论”的标签,可能会掩盖先前课程改革(1994年)(在澳大利亚部分州和地区)中存在的缺陷。直白地说,实施中的缺陷可以被识别并加以克服,也可以被忽视,从而导致循环往复,不断地设计新课程,寄希望于它能够成功地惠及学校的学生。本文旨在通过识别和研究以往课程改革尝试中的薄弱环节(即可以改进的领域),为HPE课程文献做出贡献,从而为改进课程改革提供宝贵的见解。分析过程包括查阅文献、澳大利亚国家愿景和各州的政策文件。

以及地域层面（课程教师指导方针），反思历史建构，进行分析（选择、筛选和分类）和综合。通过探究“可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考察以下三个历史和背景层面：

澳大利亚的课程改革：必要性；课程变革，促进课程
改革；以及澳大利亚健康、体育和体育课程：剖析“渐进主义”。

涌现出的主题包括课程改革过程的各个阶段和所需努力的公平性、利益相关者的信念、社会文化方法、作为学习领域的同等价值和关注、本次改革与以往改革的相似之处、各个教育层面（课堂、学校、系统、州和国家）所需的努力、以往国家管理尝试中的困难以及质量保证。

总之，就当前的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HPE）课程改革而言，这意味着，除非课程改革过程的各个阶段，特别是实施和评估阶段，都得到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否则就无法实现持续深入的课程改革。本文对相关文献的贡献提高了改革的可能性；随后，人们更加渴望看到一套在学校得到持续实施的HPE国家课程，并可以为此开展合作。因此，本文评估了迄今为止HPE国家课程改革的规划和成果，并为未来的成功指明了方向。

澳大利亚课程改革：必要性

最新国家改革的目的是在澳大利亚这个幅员辽阔、学校环境多样的国家推行社会公正的课程体系。澳大利亚教育评论员、悉尼大学教授尤因（Ewing, 2010:127）指出：“国家课程最重要的驱动力应该是公平、社会正义以及提高最弱势和最孤立学生的学习成果。”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局（ACARA）主席麦高（McGaw, 2007）认为，目前许多澳大利亚学生的教育成果更多地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而非他们的能力和技能，尤其是在将澳大利亚的教育成果与其他西方高成就国家进行比较时。此外，尤因（2010）指出，澳大利亚教育成就差异的70%可归因于学生的社会背景；这些结论表明，澳大利亚不同教育部门之间并不存在公平。

反思，正如尤因（Ewing, 2010:17）所定义的那样，是“有意识地、有目的地努力去更深刻地理解和体会我们的经验”，通过反思，我们可以从澳大利亚课程的历史构建和实施中提出建议。迪南-汤普森（Dinan-Thompson, 2009）将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国家改革（1994年）称为“事实上的”课程改革。

历史表明，第一次全国性课程改革实际上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

“1991年4月，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AEC）以最终形式启动了这些项目，决定为八个广泛的学习领域制定声明和概况，形成澳大利亚学校要教授和学习的知识和过程的模板”（AEC, 1994:50）。

第二次全国课程改革正在进行中：

“2008年,澳大利亚各级政府一致认为,为所有澳大利亚青年提供优质教育对于维持澳大利亚的生产力和生活质量至关重要。他们一致认为,国家课程将在提供优质教育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并致力于制定 K-12 国家课程”(ACARA,2011)。

管理机构明确暗示,此次推行国家课程的最新尝试lum 的开创性之处在于它与其他课程改革举措截然不同。

澳大利亚将首次采用统一的课程框架。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局 (ACARA,2010)指出,澳大利亚应该为所有中小学生制定统一的课程,而不是像目前这样,各州和领地各自采用不同的课程体系。这与上次“事实上的”课程改革截然不同,上次改革中,澳大利亚首次没有为每个关键学习领域制定单独的国家课程框架,而是制定了一项国家课程声明和概况。为一个国家制定统一的课程,这种做法看似合乎逻辑,也符合常理。然而,对健康、体育和教育 (HPE)这一关键学习领域的深入研究表明,拟议的课程改革与上次相比几乎没有变化,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变化。

这种思路指向课程改革过程。如果各州、领地、学校系统和地理区域并未像政治改革所宣称的那样处于公平竞争的环境中,那么可以说,上次全国课程改革 (即事实上的课程改革)中的课程改革努力是不一致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的并非承诺的课程改革,也并非以新的政策构建 (书面课程)的形式呈现。相反,课程改革的实施和评估阶段需要持续的时间、精力、支持和压力才能完成。只有当课程改革过程的各个阶段都得到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时,澳大利亚教育各领域才能实现持续而深刻的课程改革。

现行的国家课程只是一个总体框架,它本身并不必然带来改变,因为课程改革的决定因素在于学校和课堂的实际情况。此外,历史经验表明,很少有改革措施能够真正落实到课堂教学中 (Cuban,1990);因此,也就无法进行任何改进。正如澳大利亚上次事实上的课程改革一样,ACARA (2010:10)指出,课程改革需要经历“四个相互关联的阶段:课程构建、课程编写、实施以及课程评估与审查”。如何完成这些阶段至关重要。学校的不同背景和自主权固然重要,需要加以考虑;然而,这些因素也使得本已复杂的课程实施阶段更加复杂 (Kirk和Macdonald,2001)。Ewing (2010:10)也支持这一观点:

“鉴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方式各不相同,人们对学习方式的信念和实践也各不相同,而且学习发生的背景也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必须认识到,任何一堂课都不可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从一个郊区实施到另一个郊区,更不用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

历史上,澳大利亚的教育一直由八个州和领地负责,这源于1901年通过的宪法决议 (Braithwaite,1994)。“联邦政府在课程设置方面拥有经济利益,确保学生获得能够提升未来几代人收入能力的知识和技能”(Dinan-Thompson,2006:27)。因此,各州和领地往往通过承诺联邦政府的拨款来争取同意 (Ewing,2010)。州和领地政府

宪法赋予的教育责任似乎在过去一直阻碍着国家层面的教育改革努力（Ewing,2010）。协调八个不同政府部门的合作难度可能远高于由一个政府负责强制推行教育。然而,与以往的改革一样,课程实施的最终责任仍然在于各辖区、教育系统和学校（ACARA,2010）。因此,课程改革的实施和评估等相关环节被下放至各州和地区,最终下放至各学校系统和学校（Kirk和Macdonald,2001）,这无疑增加了国家管理机构的管理难度。

“质量”保证得到了国家改革利益相关者的认可（AITSL,2010）,代表着教学和学习的问责制。它是改革议程的核心,因为“高质量的教学和学习以及学生的学业成就与课程规划和实施息息相关”（Ewing,2010:39）。质量保证计划通过全国统一的教师注册制度和教学质量的提升来实现;它由澳大利亚教学与学校领导协会（AITSL）牵头,并由教育、幼儿发展和青年事务部长理事会（MCEECDYA）指定（AITSL,2010）。

这一过程包括2011年在澳大利亚首都领地（ACT）首次引入教师注册制度,该制度由ACT教师质量研究所负责实施。此外,澳大利亚教师和学校领导协会（AITSL）的职责是“制定和维护严格的国家教学和学校领导专业标准,并根据这些标准实施一套公认的国家教师和学校领导认证体系”（《教育评论》,2010:32）。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局（ACARA）还建立了“我的学校”网站,根据McGaw（2011）的说法,该网站有两个用途:首先,它为家长和学生提供每所学校的信息;其次,它为学校及其社区提供学生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与其他学校学生的比较数据。

从教师标准的制定和学生成绩的比较可以看出,质量保证是当前国家改革的关键方面,它对教师素质和问责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3年至2006年间,澳大利亚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的成绩显著下滑,这促成了最新的国家课程改革。“2000年,澳大利亚的识字能力排名第四,而其在PISA阅读方面的相对排名已从2000年和2003年的第二名下滑至2006年的第六名”（McGaw,2010）。因此,英语、数学和科学这三个主要考察15岁学生表现的关键学科领域,以及历史,被优先考虑并纳入了当前国家课程的第一阶段（ACARA,2010）。在这项改革中,政治化的问责议程以质量保证的形式强势存在,而这项改革似乎确实是以结果为导向的。

课程变革:课程改革的目的是“课程变革”和“课程改革”这两个术语经常被混用。然而,它们本质上截然不同;课

程变革是课程改革得以实现的前提。尤因（Ewing,2010:148）对这两个术语进行了清晰的阐述:

“变革”一词通常指采取新的行动:从一种状态、形式或方向过渡到另一种状态、形式或方向。课程改革的含义远不止于变革 它直接表明这种变革将带来改进或提升。因此,课程改革意味着……

学生们将从创新的教学实践、材料或教师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改变中受益。换句话说,他们在学校的体验将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改善。

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旨在促成课程改革,正如迪南-汤普森 (Dinan-Thompson,2001:9)所言,这“意味着教育整体规划,包括教师及其意识形态,都将发生某种程度的转变”。课程改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斯帕克斯,1991),也具有社会复杂性(富兰,2001:69),而这些事实往往被忽视(霍尔,1992),因为许多国家的学校和教师似乎对真正的(深层次的)变革抱有极大的抵触情绪,往往只经历表面或肤浅的改变(斯帕克斯,1991)。“伯恩斯坦将教育话语描述为一种‘原则’或‘规则’,它将一系列话语在教育环境中相互联系在一起”(柯克和麦克唐纳,2001:553)。似乎此前只实现了表面上的课程改革,包括体育教育中教师的论述和意识形态的改革。

教师的意识形态受到上次“事实上的”改革中健康、体育和体育(HPE)关键学习领域所采用的社会文化视角的影响(Kirk 和 Macdonald,2001),这种视角“作为一种复杂的反话语出现,其灵感来源于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的批判教育学家和批判教育学”(Cliff,Wright 和 Clarke,2009:166)。更重要的是,这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州和地区改变了健康、体育和体育的教与学,特别是职前教师的培养:

“作为一种解读 HPE 内容和问题的视角,它对 HPE 教师的工作以及职前教师教育计划如何培养这些教师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因为它的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基础与 HPE 主要以医学、生物物理和心理学为基础的理论基础截然不同;其次,因为它关注社会和文化对健康的影响,这与几乎完全将健康责任归咎于个人及其决定的观点相悖”(Cliff,Wright 和 Clarke,2009:165)。

虽然社会文化视角在全国范围内得到采纳,但这一视角在各州和地区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HPE)课程实施中的渗透程度却大相径庭。例如,新南威尔士州教师协会(NSWIT)针对该州小学或中学HPE课程的学科内容要求(节选)

2010年7月发布的政策文件指出,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师在关键学习领域的最低要求包括体育、健康和个人发展(权重相同)方面的学术学习,并以文化和社会学视角为基础。此外,该关键学习领域被命名为个人发展、健康和体育教育(PDHPE)(表1)。

因此,新南威尔士理工学院的要求倡导 1994 年 HPE “事实上的”国家声明和概况的原则,并促进社会文化视角。

然而,维多利亚州的情况并非如此,维多利亚州研究所教学(VIT)专业领域指导方针政策(2012年)规定了表2中所示的指导方针。

这项政策缺乏社会文化视角,表明其并未偏离以医学、生物物理和心理学为主的体育教育基础。此外,关键学习领域被命名为“体育教育”,而迪南-汤普森(2006)指出,该名称与1994年国家声明和概况中提及的关键学习领域名称相同。

这里既没有社会文化健康,也没有个人发展,这再次引发了一个问题。

表 1. NSWIT (2010 年)HPE 中学教师要求。

学科领域： 7-12 年级		第一教学科目的相关学术研究领域	第二教学科目的相关学术研究领域
PDHPE	主修 (三年学位课程)	至少修读过四门二级或以上级别的个人发展和/或健康研究 (具有社会文化视角)和/或体育课程	至少两年 (四个学分)的个人发展和/或健康研究 (具有社会文化视角)和/或体育教育专业的学位课程学习,其中至少两个学分达到二级或以上水平。
	和		和
	至少修读三门健康教育课程,内容包括心理健康、性健康、人际关系、毒品教育、儿童保护教育、性别研究和风险行为。		至少修读两门健康教育课程,内容包括心理健康、性健康、人际关系、毒品教育、儿童保护教育、性别研究和冒险行为。
	和		和
	至少修读三个单元的体育课程,包括现代体育活动、舞蹈、体操、游戏和运动。职业导向课程、教练证书以及体育和体育活动裁判/裁判员资格认证不被认可为同等学历。		至少修读两门体育教育课程,包括现代体育活动、舞蹈、体操、游戏和运动。职业导向课程、教练证书以及体育和体育活动裁判/裁判员资格认证不被认可为同等学历。

表 2. VIT (2012) HPE 专业领域指南。

体育 (小学教学)

体育教育专业主修课程应包括人体运动 (例如生长发育、运动生理学、技能习得)以及水上运动、游戏、基础运动技能、体能教育、舞蹈、田径、球类运动和体育教育等技能活动领域的学习。

申请人需持有有效的二级急救证书以及有效的澳大利亚游泳协会 (AustSwim)游泳和水上安全教师证书 (或有效的澳大利亚游泳教练和教师协会 (ASCTA) -澳大利亚游泳协会教师证书)。

体育 (中学教学)

体育教育专业一年半的学习应包括以下领域的学习: (a)学科学习: 人体运动 (例如解剖学、生理学、运动生理学、生物力学、生长和运动发育、技能习得以及体育活动的心理社会方面)、健康和营养; (b)技能:基本运动技能、控球、舞蹈、游戏、体能教育、田径、水上运动。

体育教育

有效的急救证书 (二级紧急急救证书)以及有效的澳大利亚游泳协会游泳和水上安全教师证书 (或有效的澳大利亚游泳教练和教师协会证书)。

(ASCTA - 澳大利亚游泳教师证书)是必需的

超过了上次“事实上的”国家课程改革所带来的课程变革程度。

通过《健康与体育教育》(HPE)课程材料(1994)和社会文化方法促进教育中的社会正义和公平,似乎为其他课程的关键学习领域树立了榜样。这一点在国家课程中以及《墨尔本宣言》中为澳大利亚青年制定的教育目标中都有所体现:

目标 1:澳大利亚教育促进公平和卓越;目标 2:所有澳大利亚青年都成为:成功的学习者、自信和有创造力的人,以及积极和知情的公民(MCEETYA, 2008)。

这些目标驱动着国家课程框架的构建;它们支持批判性探究,正如麦克唐纳(Macdonald,2013:102)所指出的,这意味着“内容和教学方法能够让所有学生成为积极的学习者,并在学习过程中质疑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关于体育活动和健康实践及机会在本地和全球范围内如何发挥作用的观念”。因此,国家课程以社会文化视角为基础(ACARA,2010)。

了解这种观点最初如何在体育与运动教育(HPE)领域发展至关重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澳大利亚学校的体育与运动教育课程被认为处于危机之中(Dinan-Thompson,2009;Tinning,Kirk,Evans等,1994)。课程研究表明,这种“危机”在国际层面也同样存在(Dinan-Thompson,2009:4)。体育与运动教育会议和期刊上关于危机的“内部”讨论促使澳大利亚参议院(澳大利亚联邦政府,1992)对澳大利亚教育系统中体育与运动教育的现状展开调查。参议院环境、娱乐和艺术常设委员会的报告(澳大利亚联邦政府,1992)证实了这些关于危机的“内部”讨论(Dinan-Thompson,2009)。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澳大利亚学校普遍支持体育教育(HPE),但实际上,高质量体育教育的机会却在减少。问题主要出在这一关键学习领域的资源和时间分配上,导致儿童的技能水平和体能急剧下降(Tinning,Kirk,Evans等,1994)。另一个主要问题是“没有聘用合格的体育教师来教授所有儿童体育和学校体育运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1992:xiv)。此外,小学教师的就业条件中也没有要求体育教育方面的资格认证或正规培训(Moore,1994)。韦伯斯特(2001:1)建议“小学教师职前教育应包括与教学大纲内容直接相关的必修单元,并为教师提供进一步专攻体育课程的机会”。

根据澳大利亚健康、体育和娱乐委员会(ACHPER)(2011)的说法,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存在:“一些学校,特别是小学,确实难以提供高质量的体育课和运动课程。”此外,在与澳大利亚类似的英格兰和威尔士,也存在与实施相关的担忧:“研究表明,小学本身无法提供高质量的早期体验,而中学体育专家的介入可能为时已晚,无法对大多数儿童的能力、认知和动机产生影响”(Kirk,2005:240)。

时至今日,澳大利亚仍有毕业生教师在完成教师学位时未学习任何体育与健康教育(HPE)课程,却负责在学校实施这一学习领域(Lynch,

2005年、2013年)。这再次表明,一些学校的课程改革即便有改革,也可能只是流于表面。在澳大利亚,小学体育教育(HPE)专科教师的聘用并不普遍,而且根据迪南-汤普森(Dinan-Thompson,2009:48)的说法,人们常常质疑“谁在教体育教育,谁被认为有资格在学校教体育教育”。因此,20年前参议院调查提出的建议似乎并未得到落实。

体育教师需要能够提供涵盖所有领域的高质量体育课程,包括体育活动、健康和个人发展。最新的国家课程标准对此表示支持,其中指出:“学校和教师决定教学方法和其他教学安排”(ACARA,2010:10)。这意味着教师需要了解和理解体育教育中存在的各种教学方法,并能够根据具体的学习体验选择最合适的方法(Tinning,1999)。这通常意味着选择批判性的、社会公正的教学方法,而不是传统的、以科学和表现为基础的体育教学方法(Tinning,2004)。

与本次国家课程改革一样,上次的课程改革也是由各州和领地负责实施的。在昆士兰州,1999年的体育与健康教育(HPE)课程大纲首次由昆士兰州的三大教育系统——昆士兰州教育局(EQ)、昆士兰州天主教教育委员会(QCEC)和昆士兰州独立学校协会(AISQ)——共同指导制定。该大纲是一项公共渐进式教育政策(Dinan-Thompson,1998),并在所有三个教育系统中进行了试点;然而,具体的实施过程则由这三个教育系统各自负责(Dinan-Thompson,1998)。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局(ACARA,2010:25)指出,最新的国家课程框架似乎也遵循同样的安排:“各州和领地学校及课程管理机构负责澳大利亚课程的实施。”

本次调查中逐渐显现出一个主题:简而言之,人们在课程改革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精力于课程的制定和编写阶段,却忽视了实施和评估阶段。因此,一段时间后,一切又回到了“旧课程被淘汰,新课程被引入”的状态,再次回到课程的制定和设计阶段,如此循环往复。教育改革的问题更多地在于“规划和协调涉及数千人的多层次社会进程的困难”(Fullan,2001:69)。为了充分理解这一过程,Goodson(1997:196)建议“必须深入探究课程内部”,而根据Sparkes(1990)的观点,这意味着要考察教师变革的各个层面,从而探究学校中深层次的、真正的变革。除非所有三个层面都得到显著的建立,否则最终只会产生表面的改变(图1)。

富兰(Fullan,2001)的观点也支持这一观点,他认为,一项全面实施的创新或改革将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改变:(1)课程材料;(2)教学实践;(3)关于课程和学习实践的信念或理解。“有效的改进策略需要理解过程,这种思维方式无法用任何步骤清单来概括”(富兰,2001:71)。这对学校来说会造成困惑和问题,因为“变革的目标和过程受到现有结构、资源和传统的狭隘限制,导致学校始终无法满足青少年及其社区的需求”(麦克唐纳,2003:139)。

真正的改变涉及人们对周围环境信念的转变,这对相关教师而言可能具有威胁性和压力性(Sparkes,1991)。转变往往会导致冲突、损失和挣扎,而这些恰恰是成功改变的根本所在(Fullan,1982)。Dinan-Thompson(2001:9)认为,“真正的改变”更恰当的说法是“真诚的改变”,它包含了“情感的重要因素以及互动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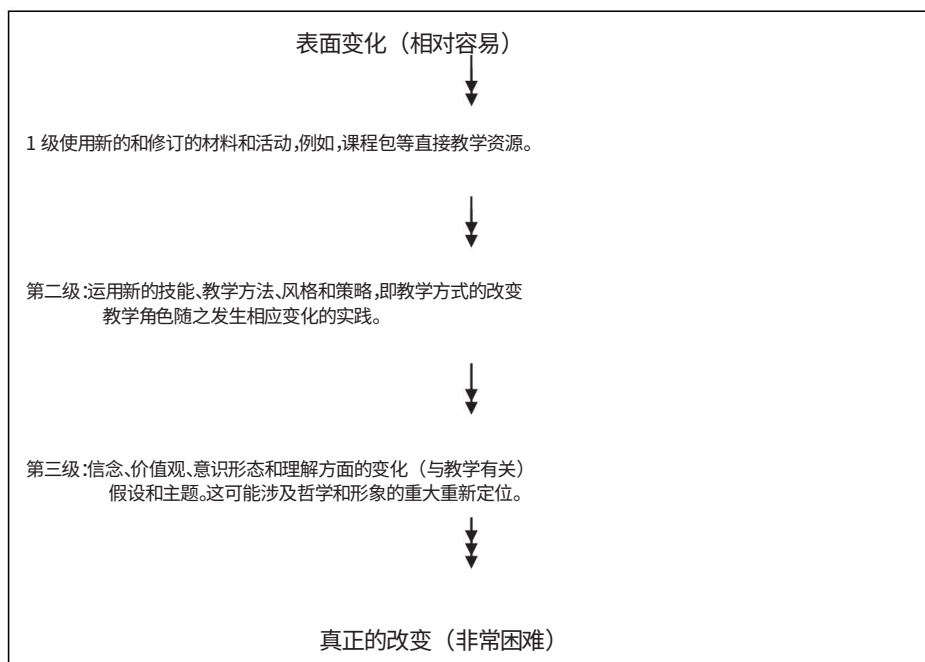


图 1. 教师变化的水平 (Sparkes,1990:4)。

在教师更迭过程中,哈格里夫斯 (1997:109)警告说,如果在教师更迭过程中忽略情感因素,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课程改革之后,“情绪和感受只有在改革后期才会重新进入改革过程”。因此,真正的变革需要考虑那些常常导致变革的微观政治因素。改变失败 (Datnow,1998;Dinan-Thompson,2002;Sparkes,1990)。

本次国家改革与上次“事实上的”改革一样,旨在实现课程目标。通过协作方式进行变革。ACARA 的工作是与众多机构合作开展的。利益相关者范围广泛,包括教师、校长、政府、州和地区教育部门。政府部门、专业教育协会、社区团体和广大公众

(ACARA,2011)。根据麦克唐纳 (2000:12)的说法,这种方法需要压力的平衡:

“课程的重大改革需要支持和压力。”压力能够推动课程改革。

变化将在个人、职业和社会层面发生 (Candy,1997)。个人压力

包括课堂内部的变化,并取决于教师的年级等因素。

班级学生构成、教学方法、教职工调动、职业方向以及教师的

生活方式。学校管理、政策和课程的变化可能会带来职业上的变革压力。教育模式在国家 and 国际层面的影响

水平的提高导致社会内部变革的压力。社会变革可能会影响……

教师的职业和个人生活 (Candy,1997)。

课程改革不仅需要教师个人的努力,也需要学校的共同努力。

系统和专业教学水平。麦克弗森 (1994)指出,高要求往往是

教师被赋予对学生学习和发展的责任,但过去这一做法的成效令人质疑。在昆士兰州的体育与健康教育 (HPE) 背景下,沃尔姆斯利

(1998:7)指出,“如果政策代表实践,那么体育教育似乎就是一种……”

课程领域变革的阻力极大。学校、系统和专业层面的努力需要包括专业发展,这是“改进教育过程的根本因素”(Day, 1994:108)。教师职业的悖论之一是,尽管学生终身学习受到重视,但对教师终身学习的支持却往往不足(Sachs, 1997)。

通过考察澳大利亚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HPE)领域的发展历程,可以进一步佐证“事实上的”课程实施方案可能并不完善的观点。我们无需追溯太悠久的历史,就能发现新国家课程的理念或许并不像管理机构所倡导的那样具有革命性或前景光明。

澳大利亚健康、体育和体育(HPE)课程:剖析“渐进主义” 澳大利亚HPE课程改革在全

国范围内似乎并不一致,一些州对1994年版课程的实施比其他州更为渐进。此外,我认为这种不一致性之所以未被察觉,是因为HPE领域缺乏关注或重视。近期课程改革期间引发的恐慌就印证了这一点,当时人们担心HPE可能会被排除在最新的国家课程体系之外(澳大利亚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委员会,2010)。值得注意的是,HPE直到2010年4月中旬才被确认为纳入国家课程的学习领域之一。Ewing(2010:140)指出:“其他关键学习领域,例如社会、健康和体育教育,为何尚未纳入规划,仍然不明。”澳大利亚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委员会(ACHPER,2009)也曾对HPE可能被排除在国家课程之外表示严重关切。

“澳大利亚健康、体育和娱乐委员会(ACHPER)将继续游说,如果这是加入国家课程体系的必要条件的话,但我们更希望健康与体育教育能够被纳入其中,因为它与生活方式教育息息相关且具有公信力,并且对整个课程的学习都至关重要。”

这种担忧源于澳大利亚课程发展史上的一系列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健康与体育教育这一学习领域长期被忽视。斯托尔茨(Stolz,2009:45)强调,“从历史上看,健康与体育教育这门学科在教育体系的各个层面,甚至几乎所有层面,都难以获得应有的认可”。布鲁克和彭尼(Brooker and Penney,2009:61)也支持这一观点:“健康与体育教育一直面临着被教育政策制定者和负责整体课程开发的人员持续边缘化的威胁,他们更关注其他被认为对儿童发展更为重要的学习领域。”例如,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昆士兰学校课程委员会(QSCC)在最近一次课程改革中做出的决定,就承认了这种忽视。昆士兰州的体育与健康教育(HPE)课程大纲与科学课程大纲一起被列为优先发展方向,这两个课程大纲也是最先制定的,因为人们认识到科学和体育与健康教育都曾被忽视(Macdonald,Glasby and Carlson,2000)。2010年4月,许多倡导者担心体育与健康教育不应纳入现行国家课程,但这一担忧最终得以消除,因为体育与健康教育被纳入了课程发展计划(共三个阶段)的第三阶段,适用于幼儿园至十年级的每一位学生(ACHPER,2010)。尽管如此,体育与健康教育作为一个学习领域,似乎仍然是事后考虑而非优先考虑的。

在体育教育的历史进程中,许多话语体系都影响了课程的构建和实施。这些话语体系包括军事、科学、健康和体育等,而这些话语体系又受到性别歧视、精英主义、健康主义、个人主义和中胚层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影响。

这些意识形态常常渗透到隐性课程中 (Colquhoun,1991,1992;Hickey,1995;Kirk,1992;Kirk 和 Twigg,1993;Scruton,1990;Tinning,1990;Tinning 和 Fitzclarence,1992;Tinning、Kirk 和 Evans,1993)。正是这些话语的存在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 (HPE)课程改革,尤其是社会文化视角的采纳 (Tinning 和 Fitzclarence,1992)。可以推断,如果上次HPE课程改革取得了成功,那么20年前存在的这些话语如今已不再构成威胁。然而,澳大利亚学者、昆士兰大学教授、著名 HPE 专家 Tinning (2009: vi) 对这一假设提出了质疑,他问道:“如果‘新’课程 (源自国家声明和概况)已经存在了大约十年,为什么仍然有必要倡导它所依据的原则呢?” 这表明,源自国家声明和概况 (1994) 的 HPE 课程的实施仅仅停留在表面。

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 (HPE)是澳大利亚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家政策中与其他学习领域享有同等地位。1989年,在霍巴特教育宣言 (AEC,1989)上,制定了澳大利亚教育的10项共同认可的国家目标。

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 (AEC)后来更名为教育、就业、培训和青年事务部长理事会 (MCEETYA)。《霍巴特学校教育宣言》得到了各州、领地和联邦教育部长的认可。该宣言的第九项目标是“促进学生的身体发育、个人健康和体能,并鼓励他们创造性地利用闲暇时间”(AEC,1989),这凸显了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 (HPE)作为澳大利亚教育关键学习领域的重要性。同样,在1999年《阿德莱德21世纪学校教育国家目标宣言》以及最近于2008年12月举行的《墨尔本青年教育目标宣言》中,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均被列为八大关键学习领域之一。

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 (HPE)国家声明和概况与现行的国家框架有着相似甚至相同的目标,即构建一个社会公正的课程体系。国家HPE声明基于多元化、社会公正和支持性环境这三大关键原则 (AEC,1994)。制定这些“事实上的”国家声明和概况旨在通过全国合作促进课程的一致性,实现各系统间资源的公平共享,并消除各系统间存在的非必要差异,从而构建一个全国统一的课程体系 (Marsh,1994)。这与最新的国家课程标准相符 (ACARA,2010:25)。因此,国家课程和公平教育的愿景在澳大利亚并非新概念。

1994年国家体育与健康教育 (HPE)声明和概况的制定和发布,即便不是产生了更大的推动作用,也至少与后来的改革一样重要。1994年文件的制定恰逢参议院对体育与运动教育的调查,为各州和地区制定新的HPE课程大纲提供了及时的动力 (Dinan,2000;Glover,2001;QSCC,1999a,1999b)。当时,这些战略性的政治举措为避免HPE陷入文化过时的困境提供了契机 (Kirk和Penney,1996)。尽管最新的国家课程改革备受关注,但之前的改革努力也不容忽视。根据 Glover (2001: 375) 的说法,20 世纪 90 年代是“教育政策史上一个重要而动荡的时期,标志着澳大利亚教育史上最密切的全国合作”,而国家声明和概况的制定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举措之一。

课程文件的结构,特别是当前改革的框架和上次“事实上的”改革的声明和概况,具有可比性。其目的如下:声明旨在界定该领域的独特之处和显著特征,而概况则提供……

“学生学习情况报告方式”(Glover,2001;Kirk,1995:2)。最新的国家课程“描述了按学习领域组织的知识、技能和理解,这些知识、技能和理解构成了学习领域的应有内容”(ACARA,2010:17),这取代了之前的声明的作用。该框架内的成绩标准“为评估和报告提供了全国统一的方法”(ACARA,2010:22),这与上次课程改革中概况文件的作用类似。此外,事实上,国家层面的声明和概况文件也被各州和地区用作制定各自课程大纲文件的模板。

这些文件在背景目的上也存在相似之处;1994年国家声明和概况的主要变化是从内容导向型教育转向成果导向型教育。现行的国家课程以《墨尔本教育目标宣言》为指导,该宣言强调“知识、技能和对学习领域的理解”(ACARA,2010:4)的重要性,并着重培养“通用和高阶”思维技能(Dinan-Thompson,2009:10),因为它“追求深度学习”(ACARA,2010:27)。可以说,这并非澳大利亚教育领域的新转变,而是一个在过去十年左右时间里逐渐发展壮大的理念。

各州和领地根据1994年“事实上的”国家声明和概况制定的教学大纲在术语和文件总体布局上略有不同。“然而,在课程内容/主要理念通常与年级相符这一点上,各方达成了一些共识”(Dinan-Thompson 2006: 34)。当教师在规划阶段考虑到学校的实际情况和学生的“世界观”时,在实施过程的某个阶段,教师会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从而以某种形式影响课程。“教师或其他教育工作者解读正式课程(感知课程),然后在课堂上实施、转化或应用该课程”(Ewing, 2010: 40)。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局(ACARA, 2010: 10)也承认这一点:

“各辖区、教育系统和学校将能够以重视教师专业知识、反映当地情况并考虑到学生家庭、文化和社区背景的方式来实施澳大利亚课程。学校和教师决定教学方法和其他实施方面的考虑因素。”

因此,我们必须质疑文件中术语的重要性,以及这会对学生正式课程的实施产生何种影响(如果有的话)。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术语的一致性似乎是1994年“事实上的”国家健康与体育教育(HPE)声明和概况与最新国家框架之间唯一的区别。Reid (2006)支持这一观点,他认为,构建一个连贯框架的根本动机应该是提高所有学生的学习成果。最新的课程与之前的课程相比,究竟为学生提供了哪些更多?这引发了人们对1994年“事实上的”国家声明和概况实施过程的质疑,并特别指出,在最新的改革实施阶段,有哪些不同的计划。

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总结发言

历史经验表明,除非课程改革过程的各个阶段,特别是实施和评估阶段,都得到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否则就无法实现持续而深刻的课程改革。本文探讨了澳大利亚最新的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HPE)国家课程改革有何不同之处。通过回顾HPE课程的历史构建,

具体而言,通过对文献、澳大利亚国家愿景和州课程教师指导方针的调查,可以看出,这项政治改革实施计划与之前的计划并无二致。

实施过程中必须包含政策变革,以确保教师职前培训在全国范围内保持一致。此外,还必须通过国家课程的本地化来实现深入渗透。课程改革的前提是课程本身的变革。调查

澳大利亚的课程改革尝试似乎具有循环性,并且在课程设计中占据重要地位。

总之,本文认为,为了改革以改善学生的在校体验,健康、体育和教育 (HPE)至关重要。

学习领域需要继续完成课程改革的最后阶段实施和评估工作。

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下去,并且需要课程专家、研究人员的持续支持,

以及从业人员。这项针对所有学习领域的全国性改革似乎是一种试图控制……

各州和地区的教育系统及关键课程学习领域被纳入国家主导的框架,并采用政治化的问责制议程,以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为导向(而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则被忽视);然而,这并未削弱其带来的机遇。

对于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 (HPE)而言,可以有力地论证,HPE是当代学校教育中的一个学习领域。

课程设置至关重要,如今更是如此。最后,是时候强调示范作用了。

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 (HPE)是以往课程设计中固有的要素,也是当前国家课程改革的根本原因。

得到认可。

资金

这项研究没有获得任何公共、商业或非营利性资助机构的专项拨款。行业。

参考

澳大利亚健康、体育和休闲委员会 (ACHPER) (2009) ACHPER 全国

澳大利亚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未来发展声明:2009年。可访问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achper.org.au/_files/f/902/1.pdf (2010年6月20日访问)。

澳大利亚健康、体育和娱乐委员会 (ACHPER) (2010) 国家课程。

可访问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achper.org.au/programs-activities/national-curriculum> (2010年6月20日访问)。

澳大利亚健康、体育和娱乐委员会 (ACHPER) (2011) ACHPER 支持澳式橄榄球

关于加强小学体育教育和运动的必要性的声明。可访问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achper.org.au/_files/f/27583/ACHPER%20Media%20Release%2027%2005%2011.pdf (2011年9月19日访问)。

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局 (ACARA) (2010) 澳大利亚的格局

课程版本2.0。澳大利亚悉尼:ACARA。

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局 (ACARA) (2011) 为什么要制定澳大利亚课程?可访问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acara.edu/verve/_resources/why_have_an_Australian_Curriculum.pdf (2011年7月14日访问)。

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局 (ACARA) (2012) 澳大利亚课程结构:健康与体育教育。网址: <http://www.acara.edu.au/hpe.html> (访问日期:5月10日)

2014)。

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 (1989年)澳大利亚学校教育的十项共同认可的国家目标:载于:

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会议记录。塔斯马尼亚州霍巴特,4月。

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 (AEC) (1994) 关于澳大利亚健康与体育教育的声明

学校。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卡尔顿:课程公司。

澳大利亚教学与学校领导力研究所 (AITSL)有限公司 (2010)职前教师教育项目国家体系 咨询提案。2010年9月,墨尔本:AITSL,

澳大利亚政府。

- Braithwaite J (1994) 澳大利亚课程治理,1981-1991 年。《课程研究杂志》26(5): 541-552。
- Brooker R 和 Penney D (2009) 在课程改革中寻找教师的声音。载于:Dinan-Thompson M (编) 健康与体育教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课程面临的问题。南墨尔本:牛津大学出版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分社,第 60-79 页。
- Candy PC (1997) 终身自主学习。自主专业发展:昆士兰州教育专业发展联盟报告。图翁:昆士兰州教师注册委员会。
- Cliff K,Wright J 和 Clarke D (2009) 健康与体育教育中的“社会文化视角”意味着什么?载于:Dinan-Thompson M (编) 健康与体育教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课程问题。南墨尔本:牛津大学出版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分社,第 165-182 页。
- Colquhoun D (1991) 基于健康的体育、健康主义意识形态和受害者有罪论。体育教育评论 14(1): 5-13。
- Colquhoun D (1992) 技术官僚理性与体育课程的医学化。体育教育评论 15(1): 5-11。
-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1992 年) 体育与运动教育 参议院常设委员会报告 关于环境、娱乐和艺术的 T恤。澳大利亚堪培拉:参议院印刷局。
- Corbin C,Welk G,Corbin W 等 (2011) 健身与健康概念。第 9 版。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
- Cuban L (1990) 不断改革。教育研究者 19(1): 3-13。
- Datnow A (1998) 教育变革的性别政治。伦敦:Falmer出版社。
- Day C (1994) 教师和学校专业发展规划:一种原则性方法。载于:Simpson T (编)《1994 年教师教育者手册》。布里斯班:昆士兰科技大学印刷服务部。
- Dinan M (2000) 昆士兰州健康与体育教育政策文件构建中的公共关注点和私人利益:初步分析。课程视角 20(1): 1-7。
- Dinan-Thompson M (1998) 昆士兰州健康与体育教育政策的构建与重建。载于: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协会会议,澳大利亚阿德莱德,1998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 日。
- Dinan-Thompson M (2001) 教师面临健康与体育课程变革:信念、价值观、情感和互动的万花筒。ACHPER 健康生活方式杂志 48(1): 9-13。
- Dinan-Thompson M (2002) 课程建设与实施:昆士兰州健康与体育教育研究。布里斯班:昆士兰大学出版社。
- Dinan-Thompson M (2006) 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现在?载于:Tinning R,McCuaig L 和 Hunter L (编) 澳大利亚学校的健康与体育教育。澳大利亚弗伦奇斯福里斯特:澳大利亚培生教育出版社,第 25-39 页。
- Dinan-Thompson M (2009) 健康与体育教育:澳大利亚和新英格兰课程面临的问题 新西兰。南墨尔本:牛津大学出版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分社。
- 教育评论 (2010)。教师国家专业标准。教育评论,6月,32-33。
- Ewing R (2010) 课程与评估:叙事方法。南墨尔本:牛津大学出版社。
- Fullan M (1982) 教育变革的意义。纽约:教师学院出版社。
- Fullan M (2001) 教育变革的新意义。第3版。纽约:教师学院出版社。
- Glover S (2001) 健康与体育教育中教学话语的社会建构:1992-1994 年国家声明和概况编写研究。布里斯班:昆士兰大学出版社。
- Goodson I (1997) 《不断变化的课程:社会建构研究》。纽约:Peter Lang。
- Hall G (1992) 变革促进团队的特征:实施成功的关键。教育研究与展望 19(1): 95-110。
- Hargreaves A (1997) 用心思考教育变革。美国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Associ-课程与发展。

- Hickey C (1995) 体育教育可以算是体育教育吗?ACHPER 健康生活方式杂志 42(3): 4-7。
- Hobart T (1989) 澳大利亚学校教育的十项共同认可的国家目标:会议记录
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会议。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1989年4月。
- Jewett A,Bain L 和 Ennis C (1995) 体育课程过程。第 2 版。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
美国:布朗和基准公司。
- Kirk D (1992) 体育教育、话语与意识形态:揭示隐性课程。《探索》
44: 35-36。
- Kirk D (1995)。在健康和体育教育声明和概况中定位体育教育。
载于:塑造未来:健康与体育教育的挑战与变革会议,澳大利亚布里斯班,1995 年 4 月 23 日至 24 日。
- Kirk D (2005)。体育教育、青少年运动和终身参与:早期学习的重要性
ing 经验。欧洲体育教育评论 11(3): 239-255。
- Kirk D 和 Macdonald D (2001)。教师的声音和课程变革的所有权。《课程研究杂志》33(5): 551-567。
- Kirk D 和 Penney D (1996)。澳大利亚和英国国家体育课程发展的比较分析。载于:澳大利亚健康、体育和娱乐委员会双年会议,澳大利亚墨
尔本,1996 年 1 月 14 日至 19 日。
- Kirk D 和 Twigg K (1993) 澳大利亚学校体育训练的军事化:兴起与衰落
初级学员训练计划,1911-1931 年。教育史 22(4): 319-414。
- Lynch T (2005) 对布里斯班三所天主教小学引入昆士兰州 1999 年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 课程大纲和政策发展所作出的学校反应的评估。

博士论文,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澳大利亚。
- Lynch T (2013) 小学健康与体育教师:补充辩论。澳大利亚健康、体育与娱乐委员会 (ACHPER) 积极健康杂志 20(3): 5-8。
- Macdonald D (2003) 课程变革与后现代世界:学校课程改革运动是否过时了?课程研究杂志 35(2): 139-149。
- Macdonald D (2012) 新的澳大利亚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课程改革渐进主义的案例/支持?可访问: [http://www.youtube.com/watch ?
v%0f7HJubC7f4](http://www.youtube.com/watch?v%0f7HJubC7f4) (2014 年 5 月 11 日访问)。
- Macdonald D (2013) 澳大利亚新的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课程改革渐进主义的案例/支持?亚太健康、运动与体育教育杂志 4(2): 95-108。
- Macdonald D,Glasby T 和 Carlson T (2000) 昆士兰风格的健康与体育教育声明和概况。ACHPER 健康生活方式杂志 47(1): 5-8。
- McDonald E (2000)。教育领导者还是追随者:天主教学校系统的管理与近期联邦政府教育政策。载于: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协会会议。澳大利亚
悉尼,2000 年 12 月 4 日至 7 日。
- McGaw B (2007) 危机?澳大利亚教育面临的真正挑战。《独立教育家》37(2):
21-23。
- McGaw B (2010) Barry McGaw 谈澳大利亚在国际背景下的教育。网址: [http://media.murdoch.edu.au/barry-mcgaw-
speaks-about-australian-education-in-an-international-context](http://media.murdoch.edu.au/barry-mcgaw-speaks-about-australian-education-in-an-international-context) (访问日期:2014 年 5 月 11 日)。
- McGaw B (2011) 来自 ACARA 的说明。网址: <http://www.myschool.edu.au/> (访问日期:11 月 16 日)
2011)。
- MacPherson I (1994) 思考和教授课程。课程与教学 9(2): 64-72。
- Marsh C (1994) 制定国家课程。澳大利亚悉尼:Allen and Unwin。
- 教育、就业、培训和青年事务部长理事会 (MCEETYA) (2008) 《墨尔本宣言:澳大利亚青年的教育目标》。可访问以下网址获取: [http://
www.curriculum.edu.au/verve/_resources/National_Declaration_on_the_Educational_Goals_for_Young_Australians.pdf](http://www.curriculum.edu.au/verve/_resources/National_Declaration_on_the_Educational_Goals_for_Young_Australians.pdf)
(2014 年 5 月 11 日访问)。

- Moore D (1994) 学校体育运动和体育教育面临的挑战。ACHPER 健康生活方式
期刊 41(1/143): 23-28。
- 新南威尔士州教师协会 (NSWIT) (2010) 新南威尔士州小学或中学教学学科内容要求 (节选版)2010 年 7 月。网址: <http://www.nswteachers.nsw.edu.au/Teaching-in-NSW/Subject-Content-Requirements-abridged/> (2011 年 5 月 10 日访问)。
- Penney D 和 Harris J (1998) 国家体育课程:我们做得对吗?英国
体育教育杂志29(1): 7-10。
- 昆士兰学校课程委员会 (QSCC) (1999a) 健康与体育教育初始在职培训材料。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昆士兰教育出版服务公司。
- 昆士兰州学校课程委员会 (QSCC) (1999b) 健康与体育教育 1 至 10 年级
课程大纲。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昆士兰州教育厅。
- Reid A (2006) 一致性是国家课程发展的唯一理由吗?课程视角-
tives 26(3): 66-70。
- Robbins G, Powers D 和 Burgess S (2011) 《健康的生活方式》。第 9 版。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
- Sachs J (1997) 重塑教师专业化议程:澳大利亚的经验。《教育杂志》
教学方法 23(3): 263-275。
- Scraton S (1990) 性别与体育教育。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吉朗:迪肯大学出版社。
- Sparkes A (1990) 课程改革与体育教育:走向微观政治理解。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迪肯大学出版社。
- Sparkes A (1991) 课程改革:获得一种视角。载于:Armstrong N 和 Sparkes A (编)
体育教育问题。伦敦:卡塞尔教育出版社,第 1-19 页。
- Stolz S (2009) 体育教育与国家课程。专业教育者 8(4): 44-47。
- Tinning R (1990) 意识形态与体育教育:打开潘多拉魔盒。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吉朗:
迪肯大学出版社。
- Tinning R (1999) 体育教育教学法 宝琳的故事。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吉朗:迪肯大学出版社
大学出版社。
- Tinning R (2004) 重新思考体育教师的培养:关于知识、身份和方式的思考
思考。亚太教师教育杂志32(3): 241-253。
- Tinning R (2009) 前言。载于:Dinan-Thompson M (编)《健康与体育教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课程问题》。南墨尔本:牛津大学出版社
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分社,第 v-vi 页。
- Tinning R 和 Fitzclarence L (1992) 后现代青年文化与澳大利亚中学危机
体育教育。Quest 44(3): 287-303。
- Tinning R, Kirk D 和 Evans J (1993) 健康主义与日常体育教育。载于:体育教育批判课程视角 读本。维多利亚州吉朗:迪肯印刷服
务公司,第 77-94 页。
- Tinning R, Kirk D, Evans J 等 (1994) 学校体育:意义危机。《变革教育》
1(2): 13-15。
- 维多利亚州教师协会 (VIT) (2012) 维多利亚州教师协会专业领域指南。可访问: http://www.vit.vic.edu.au/SiteCollectionDocuments/PDF/Specialist_Area_Guidelines_2012.pdf (2014 年 5 月 11 日访问)。
- Walmsley HR (1998) 昆士兰小学体育教育政策与实践 1970-1993。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昆士兰大学出版社。
- Webster PJ (2001) 教师对 K-6 个人发展、健康和体育教育关键学习领域中体育教育的看法。博士论文,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

作者简介

蒂莫西·林奇是莫纳什大学和澳大利亚联邦大学的高级讲师。